

■ 南 开 史 学 家 论 丛 ■

南炳文◎著

明史新探

苑菁題



中华书局

南 开 史 学 家 论 丛

南炳文◎著

明史新探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史新探/南炳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南开史学家论丛. 第3辑)

ISBN 978 - 7 - 101 - 05439 - 2

I. 明… II. 南…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明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389 号

书 名 明史新探

著 者 南炳文

丛 书 名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三辑)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 插页 3 字数 61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39 - 2/K · 2442

定 价 45.00 元

南开史学家论丛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 范 曾
李治安 李剑鸣 陈振江 陈志强 张国刚

主 编 刘泽华

副主编 李治安(常务) 陈志强

总 序

南开历史系创建于1923年,但前三十年历史系在南开是蕞尔小科,有时只有一两人维系,不绝若缕。进入50年代开始了迅速发展,到今天已发展为南开的“四大支柱”学科(化学、数学、经济、历史,这是校方的提法),也是全国的史学重镇。这一变化的标志要从1987年全国评定重点学科说起。那年首次评定重点学科,南开全校共获得12个,而不足百人的历史系竟有三个。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名声大噪,人们刮目相待。一些人评论:历史系向来不显山不显水,原来水有潜龙,山有卧虎!近几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一级学科评比中,南开历史学科居全国第二位,与北大相邻。重点学科重评后依然保持三个,其中中国古代史竟跃居首位。这一势态无疑为同行瞩目。出现这样局面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有大局和小局因素等等。大局是共同的,这里省略,只说小局,而且主要说1987年以前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既无“天时”之利,也无“地利”之便,剩下的只有“人和”一项。孟子说的“人和”就是称意的“人治”。就南开历史系以往的发展史而言,也只能从“人治”的角度去分析。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自身的有效发展。从制度上难于找到成因,而历史系又是著名的穷系,别的不说,一个教研室都分不到一间办公室,有一个时期系主任都没有一间办公室。因此“人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次说过,历史系有今日之显赫,我们不要忘记学术带头人,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多年的老领导。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几位先生也多次跌宕起伏,但他们四位一直居于系领导中心。郑天挺、吴廷璆是党外的

民主人士(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共),杨生茂、魏宏运先生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杨生茂、郑天挺、吴廷璆交替任系主任或副主任,魏宏运则是“党代表”,到文革后期和80年代前期则继任系主任。他们之间的组合可以说是一种奇遇,配合的也很默契,像个“不倒翁”,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免左右摇摆,但他们有一个重心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实行的“中左路线”。所谓“中左路线”,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跟而不紧”,不搞新花样,近似庄子的“应帝王”;二是有机会就抓业务。郑天挺先生、雷海宗先生、吴廷璆先生是大专家,不用多说,他们在业务上起着样板和指导作用。但他们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安排。因此杨生茂和魏宏运无疑就成为关键人物。杨生茂先生已年届人瑞,而他从来就是一团瑞气:忠厚、虔诚、精深、宽容、执着集于一身。他至今依然是一位执着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要求一统;凡事以身作则,但不要求“达人”;学术上孜孜以求,执牛耳于一方,但决不傲人,对同事和后进一贯尊重有加。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杨生茂曾是我的领导(在一起编写教材),他从来不会说让我们如何办,但我们都听从他的,他是靠身体力行来领导的!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相当多元化,但对杨生茂先生的人品与学品几乎无不翘首起敬。魏先生作为“党代表”更是处在风头浪尖。在那个“左”的时期,他也不能全离开“左”,但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他一定是“偏右”的,并依靠专家推进教学与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几位先生狠抓教材建设,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学术事业,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的几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相继出版,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也交出版社,后因被划为“右派”而终止。其他先生也都有相应的讲义印发给同学。师辈们的努力为南开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风云突变,一场急风暴雨也席卷南开,雷海宗被康生点名定为大右派。说起来有点蹊跷,这位大“右派”摘帽很早。随后又给他配备了助手,进行专业“抢救”,1961年又被请上了讲台。魏宏运先生在这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志玖先生因为雷先生辩护遭到大批署名文章的

批判,如果在其他单位难逃“右派”的厄运,但由于魏先生再三说服有关人员,使杨先生免遭一劫。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说起,没有魏先生的庇护,后果不堪设想,别的不说,一家七口(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夫人为家庭主妇)不知如何生活下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玉哲先生一向不问政治,不知从那来了一股激情,在讲授中国上古史时竟兴致勃勃地宣扬铁托在普拉的演说,这不能不招来批判。由于杨志玖先生得到庇护,王先生也就较平稳地过了关。如果真的把杨志玖先生、王玉哲先生划为“右派”,我敢说,南开中国古代史后来就不可能被评为重点学科。另外还有几位颇有才学的先生,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原单位都视为“包袱”,魏先生和杨生茂先生竟请来在历史系安家落户。那个时期不少系揪出过这种“集团”,那种“俱乐部”,相比之下,历史系却风平浪低。魏宏运先生、杨生茂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年轻人:有时间多读书!魏先生常以郑先生为例说,郑先生白天忙于公务不能读书(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夜间、假日要补回来,要向郑先生学习。新一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魏先生还热情地要青年向沈元学习(沈元,一位学历史的少年“右派”,在家励志苦读,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这个班子还商定,要每个青年教师订出进修计划,并指定导师负责,定期检查和汇报,有点像现在的在职研究生。凡此种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革命者”都要批魏先生的“右”。1959年差一点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处于半倒状态,被“挂起来”。“文革”乍起即把魏先生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这无疑是很合乎当时的政治逻辑的。但在历史系一群中,魏先生的革命资历比较长,又没有“历史问题”,出身“贫农”,他的言行多半属于重业务、依靠专家之类,也说不上什么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一时被打倒,到落实政策时又能勉强站起来。“文革”中期结合干部时,还只能是他,并且继任系主任。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痼疾”依旧,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大家编写教材,把多数人又引入“业务”之中,成就了“文革”后的一批教授。

在这篇序中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是要说明,没有郑天挺、吴廷璆、

杨生茂、魏宏运几位组合成的“中左路线”，就没有“人和”，就没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就没有学术气氛，就难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梯队，我也敢断言，也不会有三个重点学科的降临。有人说，还是“左”了一点，或许是这样。但有一个事实：魏先生几次是因“右”而倒台。再“右”一点会如何，谁来“右”？有道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对评定重点学科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论，但我认为这总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性学术水平标志，南开历史学科一下子能有三个重点学科真是不容易呀！有了重点学科为南开历史学科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因为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向重点学科倾斜，其后这个“项目”、那个“工程”以及什么“基地”、“中心”等等，都与有否重点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自从有了重点学科，南开历史学科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科研与教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我在这里说重点学科也有另一层意思，它与“南开史学家论丛”人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辑收入的作者都是我们的师辈，多数又是首次申请重点学科的带头人。这里要说明一点，吴廷璆先生无疑是“第一辑”中的首选。但当具体编辑时，得知吴先生的文集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再选入本论丛，就会发生版权冲突，无奈，只能暂付阙如，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收入。

编辑第二辑时，人选难于确定，进退维谷。多种因素制约又不能敞开编选，于是找了一个省事的办法，在难于处理的地方，以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为限。

第三辑入选者对象是新一代学者。这一代人都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也都得益于重点学科提供的条件。这一代人才济济，我没有能力一一准确评价和排座位，于是采取了更简化的办法，凡在新一轮重点学科申请中任学术带头人的都收入。这就是本编的六位同志。这个办法易于操作，但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遗憾。只能留到以后再弥补。这次编辑的原则与前两辑也有所不同，这次要求每个人拿出专题

性代表作,只要看本辑的书名就可一目了然。每个人的专长与简况在卷首作者简介中已有交代,这里不再重复。

在这十位作者中,王永祥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令人不胜唏嘘,在此谨表沉痛的哀念!

还有几位同志从南开“分身”到其他大学任教(他们还在南开兼职),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者,南开历史学科培养和成长出了出色的学者,成为“争抢”的对象,是南开的骄傲;惧者,南开流失了人才!天耶?地耶?人耶?令人叹息!南开历史学院是有情的,人虽走,茶不凉,对他们的离开,我们不免怅然,但他们为南开作出的贡献我们将永志不忘,本论丛以收入他们的著作为荣。南开永远是他们的家!

最后我要说几句我的学长范曾先生。孔子说“依於仁,游於艺”,用于范曾最为恰当。范曾靠一支妙笔画尽风流、尽述情怀,天下谁人不知?!这里我仅说几句他对母校的返哺:他创建了东方艺术系,开拓了艺术史的研究,教书育人呕心沥血;这些年来的捐赠逾千万,其中仅历史系就有数百万之巨,其中有对恩师的孝敬,有对后学的奖掖,捐建了“范伯子学术基金”,长期支持对学术研究。“仁者,爱人”,范曾,仁哉、仁哉!

是为序。

刘泽华

2006年11月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自序

这本论文集收入了本人 1996 年以来的学术文章。主要包括关于明代历史的综合性论述,关于明代文化与文献的论述,关于明代人物、社会及地方史的论述,关于明代中外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学术界研究成就的评述等,凡五部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清史,但基本研究范围限于有明一代,因而全书以《明史新探》为总名。此外,书中还收进了关于明代历史的两篇译文,附录了“我的治学经历”和“《明清史蠡测》目录”两篇文字。两篇译文与明代历史有关,是公元 1996 年以来本人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蹒跚而行的一部分,因而收入本书之中。“我的治学经历”是 2004 年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时应校庆办公室的特别邀请而作的自我学术小结,“《明清史蠡测》目录”登载着本人于 1996 年春出版的第一本自选学术论文集所收文章的题目,它们一起反映着本人的治学历程,对于读者了解本人的治学活动以便惠赐指导或有裨益,所以也收了进来。1996 年至今恰好十年,为时不可谓不长,而在治学上的所得,除著作外,几乎全部收在这本论文集中,成绩竟是如此之少。回忆起来,惭愧之至。

在《明清史蠡测》的“自序”中,本人曾由于学术上微有所获,而对南开大学和学术界诸位师友以及中小学时期诸位师长的教导与帮助、父母的培养和教诲,表达了感谢之情。这里本人对他们再次表达无限感谢之意。本论文集之问世,得力于许多师友之帮助。范曾先生之创意与慷慨解囊,历史学院党政领导门连凤、李治安、陈志强、王立华、蓝海等之主持组织、热诚关怀,都是本人不能忘怀的。高艳林同志之具体编辑、主持校勘,曹琳、雷庆锐、张艳芳、展龙、张毅、张磊等同学之反复

校对,南开大学明史研究室林延清、李小林、何孝荣、庞乃明诸先生及室内各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之用不同方式加以协助,也令本人非常感激,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另外,我还要特别谈几句关于本人的爱妻吴彦玲的情况。她在1961年秋与本人同时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在一个班读书,经同班同学的牵线,第二年下半年我们就订了婚。从此,她在完成自己的繁重的学习、工作任务的同时,任劳任怨地担负起了对本人这个身有残疾之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四十四年来,本人之所以能不分平日假期,每天基本上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钻进研究室全心全意学习或研究,全靠她的自我牺牲、理解和支持。本人的学术文章,她也常是草稿的阅读、讨论修改者。在遇到困难时,她又充当着劝慰、鼓励的角色。没有她,就不会有本人之今日。今年阴历正月初六下午,本人照例午休后到研究室读书,而当三个半小时后回到家中时,她竟已不辞而别了。言念及此,不禁泪流满面。愿她在天堂平安。谨以此文集献给勤劳、慈祥、宽厚、最富爱心的彦玲爱妻!

南炳文写于2006年2月16日爱妻吴彦玲仙逝二七之夕

目 录

自 序	(1)
明代的贡献及其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1)
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	(19)
明代文化特色浅论	(26)
洪武祭祀乐章和朱元璋	(33)
朱元璋撰二丘乐章的重视民众思想	(72)
朱元璋大祀天地乐章非用于洪武八年说	(80)
——读王圻《续文献通考》札记	
明代纂修《玉牒》考略	(89)
《万历起居注》的价值和版本	(155)
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初步研究	(165)
《万历起居注》的版本	(180)
《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	(206)
天津明抄本和日本藏抄本《万历起居注》	(216)
《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中的李廷机 内阁奏疏	(225)
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	(257)
——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263)
国家博物馆藏瞿式耜七篇奏疏抄写时代考	(275)

崔恭年谱	(283)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教训	(310)
王士琦的仕途终点和人品	(333)
明代的不良牙人及其防范	(341)
明代经济领域诓骗窃夺现象的盛行及其防范	(355)
明代载人运货的车	(368)
明代名人与天津	(379)
海河得名臆释	(382)
三岔河口记	(386)
水西庄与天津文化的包容性	(390)
关于天津设卫建城史的几个问题	(396)
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	(401)
解释关于天津设卫建城纪念日的一个疑点	(413)
释天津永乐二年设卫建城说的又一个疑点	(416)
释天津卫永乐三年创建说	(420)
天津史上不应忘却的一个人物	(425)
——张思恭和永乐初天津城墙的修筑	
陈逵未参加永乐天津筑城考	(428)
陈逵未参加永乐天津筑城再考	(435)
关于 15—16 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440)
——纪念郑和远航开始 600 周年	
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	(452)
黄斌卿遣使赴日乞师时间考	(467)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两种表现	(495)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六种表现	(508)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516)

“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	(525)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	(531)
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	(578)
——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	
一部开拓性的清史研究名著	(598)
——郑天挺《清史探微》提要	
读《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	(604)
成弘后明代社会变迁研究的里程碑	(607)
——初读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读滨岛敦俊先生新著《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和民间信仰》	(613)
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	(617)
——读沈定平关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作	
推荐一部重要的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新著	(623)
——杨启樵博士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述评	
杨著《中国社会生活史》序	(629)
何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序	(631)
李著《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序	(634)
天津人口研究的新阶段	(637)
——高著《天津人口研究(1404—1949)》序	
刘著《弘光政权研究》序	(641)
张著《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序	(644)
怀念史学大师李洵先生	(647)
——《李洵先生纪念文集》序	
《广宗县旧志校注》序	(658)
(日)松本隆晴著《试论余子俊修筑的万里长城》译文	(661)

明赵秉忠状元卷今译	(697)
-----------------	-------

附 录

我的治学经历	(704)
《明清史蠡测》目录	(719)

明代的贡献及其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明代的历史地位如何？这是明史研究者应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不仅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明代的历史，从而有利于对明史上的各个具体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而且可以从中引申出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为今人和后人提供借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发展。

一 明代的新贡献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对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时期，判断其历史地位是否应予肯定，所应加以考察的，在于它与前朝或前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是否做出了新贡献，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凡是做出新贡献、对社会进步有所推进的，就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新贡献愈多、对社会进步推进愈大，其评价就愈高；反之，没有做出新贡献、对社会进步没起推进作用、甚至拉了历史倒车，则应该给予否定的结论。这是一个通常适用的评判标准。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评判明朝，所可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正面的，是肯定的。

在明朝及明朝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基本上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以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辅、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要成分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生产力跳跃式发展、财富膨胀式积累、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局面，但只要在较长时期内不出现大面积严重妨碍社会生产的战乱局势，依凭劳动者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生产技术以至生产力的其他方面即可缓慢提高和进步，社会财富的总量也可日积月累地增加起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

加,必然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手工业和商业的日趋活跃,造成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成分在社会生产中比重的降低,久而久之,甚至影响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以上种种提高、增加、变化,尽管都是极其缓慢的,然而不得不称之为进步。这样的进步,在明朝 200 余年中是不难看出的。

明朝之所以能够做出新贡献、促进社会的进步,乃在于它能够在 200 余年中大体维持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基本上避免了较长时期内严重妨碍社会生产的大面积战乱的发生。有明一代,尽管发生过多次战争,有明初的统一战争,有靖难之役、平定朱真播反乱之役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有镇压唐赛儿起义、镇压刘六刘七起义、镇压李自成起义等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有对付鞑靼、瓦剌、女真等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有抗击倭寇、驱逐西方殖民者骚扰沿海等对外战争,但从总体上看,除靖难之役期间及明朝末年等少数时期外,明朝在 200 余年中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是处于和平环境之中的。明朝 200 余年中能够大体维持和平统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在于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结束了广大汉人遭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局面,使明朝消除了元朝那样民族矛盾一直普遍存在十分尖锐从而易于导致辖境内随时发生大规模民族战争的危险。二在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承认了农民通过元末农民战争获得的胜利果实,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缓和了土地集中的矛盾,使明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有数量颇多的小自耕农,这一方面增强了明朝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推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三在于明朝逐步改变了元朝集权程度不高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和皇帝的权力,分散和削弱了地方官吏及朝中单个大臣的职权,剥夺了地方藩王的参政权和统军权,从而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基本上不易于发动叛乱,即使发动叛乱,也易于镇压,不至于酿成长期的大规模战乱。在中央和皇帝权力加强的情况下,其对付农民起义、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侵略者来犯的力量,也得以大增,从而限制了这几类战争的扩大蔓延。